

# 魏源《诗经·国风》次第研究与今文经学理论的建构<sup>[\*]</sup>

李树军

(辽宁大学 文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6)

**[摘要]**魏源《诗古微》有两种版本,一种是道光初年刻二卷本,另一种是道光二十年二刻二十卷本。《诗古微》初刻本与二刻本关于《诗经·国风》次第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其初刻二卷本《国风》次第不同于《毛诗》《左传》和《诗谱》,是一种全新的顺序,在二刻二十卷本中,魏源放弃了这一次第,而借鉴了郑玄《诗谱》的次第,并对其义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魏源《国风》次第研究前后的差异与其今文经学理论的探索密切相关。魏源《诗古微》关于《国风》次第的研究对于现代的《诗经》学研究仍然很有意义。

**[关键词]**《诗古微》;初刻本;二刻本;《诗经·国风》次第;今文经学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4.01.015

《诗经·国风》的次第是怎样编排的?孔颖达之后到清代魏源之前,一些学者陆续地研究了这个问题。学者们发现,文献中《国风》的顺序并不一致,大致分为三种:《毛诗》的顺序,即今本流传下来的顺序;《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在鲁国观乐的顺序,即古乐的顺序;郑玄《诗谱》所记的顺序,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三家《诗》的顺序。魏源在《诗古微》的初刻本与二刻本中确定了两种不同的《国风》顺序,这两种顺序同魏源今文经学理论的探索和构建密切相关。

## 一、《诗古微》的两种《国风》次第与前代学者的相关研究

魏源在《诗古微》初刻二卷本和二刻二十卷本中所列的《国风》顺序不同,前者代表了其早期的观点,后者则代表了其后期的观点。这些次第的具体情况见下页表1。

孔颖达之前,很少有学者关注这个问题,他说:“《周》、《召》,风之正经,固当为首。自卫以下,十有余国,编此先后,旧无明说,去圣久远,难得而知。”<sup>[1]</sup>之后,很多学者都研究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见解,这些见解和观点基本是围绕《毛诗》所列次第展开的。在十五“国风”中,《周南》《召南》排列在前面,

作者简介:李树军,文学博士,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清代今古文经学理论下的《诗经》学研究”(18YJA751018)的阶段性成果。

表1 《国风》次第情况表

《毛诗》	周南	召南	邶	鄘	卫	王	郑	齐	魏	唐	秦	陈	桧	曹	豳
《左传》	周南	召南	邶	鄘	卫	王	郑	齐	豳	秦	魏	唐	陈	桧	(曹)
《诗谱》	周南	召南	邶	鄘	卫	桧	郑	齐	魏	唐	秦	陈	曹	豳	王
《诗古微》(二卷)	周南	召南	王		卫	郑	齐	唐	魏	秦	陈	曹	桧	豳	
《诗古微》(二十卷)	周南	召南	卫			桧	郑	齐	魏	唐	秦	陈	曹	豳	王

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时,“自《桧》以下无讥焉”,没有《曹风》,所以上表中《曹风》用括号表明。

学者们对此是没有异议的。《诗大序》说:“《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学界认同《诗大序》的观点,认为《周南》《召南》作为周王朝端正开始的大法和周初朝廷教化的根基,理应排在前面。学者们所关注的是后面十三“国风”的次第。说到“国风”次第的原则,人们自然想到诗文编纂中的时间和地理因素,时间早的排列在前面,时间靠后的在后面;重要的、地域大的邦国排列在前面,小的邦国排在后面。孔颖达发现,这些因素不是《邶》《鄘》《卫》等十三国风次第的原则,他认为国风次第综合了多种因素,“二三拟议,悉皆不可,则诸国所次,别有意焉。盖迹其先封善否,参其诗之美恶,验其时政得失,详其国之大小,斟酌所宜,以为其次。”<sup>[2]</sup>在这里,孔颖达根据所录十三“国风”的情况,进行了收录原因的分析。他总结了这样几条原则:一是邦国分封先后与诗作之先后;二是诗之美恶与政教得失相同与否;三是与周朝廷亲近与否;四是邦国大小。孔颖达认为编选者综合这几条原则选录并确定了国风的顺序。具体说来,《邶》《鄘》《卫》是殷商邦畿之风,分封时间早,于是列为变风之首,其美刺相同,《邶》《鄘》《卫》之间的顺序则根据诗歌创作时间的早晚排列。《王风》的诗歌稍晚于《邶》《鄘》《卫》,由于是王畿之风,其位置不能过于靠后,所以列在《卫风》之后其他国风之前。郑桓公是周宣王的弟弟,郑武公又在周平王东迁中功劳很大,郑国“既亲且勋”,于是《郑风》在《王风》后面。魏国有先王风化,所以《魏风》在《郑风》后面。《唐风》是晋国之风,晋国尊贵,但是其政教昏乱,故而列在《魏风》之后。秦国从秦仲时开始强大,成为诸侯国较晚,所以《秦风》在《唐风》之后。陈国地位尊贵,但是国无令主,民多淫昏,所以其风在《秦风》之后。桧国与曹国,分封虽早,但是国乱政辟,所以列于后面。《豳风》记录的是周公之事,尊周公,所以将《豳风》看作一国之风,列于最后,使其兼有《国风》与《小雅》之美。这些邦国之风的顺序或体现了其中的一条原则,或体现了其中的若干条原则。孔颖达的观点对后世学者有很大的影响。

宋代,欧阳修、程颐、朱熹对《国风》的次第都进行了解释。欧阳修认为,《国风》两两相配,各有义例。《诗本义》:“《周》《召》以浅深比也,《卫》《王》以世爵比也,《郑》《齐》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秦》《陈》以祖裔比也,《桧》《曹》以美恶比也,《豳》能终之以正,故居末焉。”《周南》《召南》受先王之化,所以排在最前面,《周南》受教化深,《召南》受教化浅。卫是商都之地,王是王畿之地,商纣王、周幽王皆不能保其爵位,故而在正风后面,“加卫于先,明幽纣之恶同而不得近于正焉。”《郑风》《齐风》体现了族群亲疏的原则,周尊同姓,郑国是同姓之国,齐国是异姓之国,所以《郑风》居前,《齐风》在后。《魏风》《唐风》体现了地域相邻的原则,同时也体现了政治教化方面的问题,魏国是受舜教化的地域,晋国则是尧教化的地域,《魏风》排在《唐风》的前面,是说明晋国之乱与魏国之乱有不同的原因。陈国为舜之后,却不能光大舜的功绩,而秦襄公却能光大先祖的功业,所以《秦风》在前。《桧风》与《曹风》因为美刺相同,列于后面。《豳风》列于《国风》最后,是希望能归于正道。程颐认为,《周南》《召南》是正风,所以排在前面,卫国吞并邶、鄘,所以《卫风》为变风之首。诸侯擅自相并,周王的

权威消失,周王朝的诗本应列为雅,但是此时只能降低为风,所以《王风》在《卫风》后面。郑国废弃先王之法,所以列于《王风》后面。齐国君臣失去本分,人伦混乱,所以《齐风》列在《郑风》后面,从此无不乱之国。魏国受舜之化,晋国始于尧统治的区域,其风也跟着变化,先代的风化礼乐消亡殆尽。秦国不用周礼,先王之遗俗消失,所以《秦风》列在《魏风》《唐风》之后。《陈风》《桧风》《曹风》为乱之终,故思周道。所以《邶风》列在变风的后面,以表明王业兴盛的原因。朱熹也对《国风》的顺序进行了解说,他认为,邶、鄘、卫是殷商故墟,周朝廷引以为鉴,所以在正风后面;周不吸取殷商的教训,导致东迁,所以《王风》紧接着《卫风》;郑武公随周平王东迁,所以《郑风》列在《王风》后面。《齐风》《魏风》《唐风》《秦风》等变风体现了由周王之道变为霸王之道。《陈风》在《秦风》等之后,因为周定王九年,楚庄王讨伐陈国,中国无霸主。桧国灭于西周末年,天下无主,曹国灭于春秋末年,天下没有霸主,所以《桧风》《曹风》列于《陈风》之后。变风的顺序大致是根据社会混乱的程度和周家之道的体现与否排列的,越来越混乱,越来越无道,乱极而思治,所以《邶风》在《国风》最后。

这些学者对《国风》的排列顺序进行了较为细致而深入的探讨。欧阳修的义例非常琐碎,程颐、朱熹的观点系统性稍强,对微言大义의挖掘也较为充分。黄中松说:“夫经遭秦火之后,篇什岂无散乱,十五《国风》必有先后之次,则一国之风更宜有次,今即序说以求诗。《王风》桓王之诗,在平王之前。《郑风》文公之诗,在庄公之间。一国且然,而谓十五《国风》不失其旧,必强为之说,即多穿凿之病。”朱熹的观点也就“稍为贯串,终亦牵强”。<sup>[3]</sup>不过,这些学者的观点对魏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 二、魏源对《国风》次第义例的阐释与今文经学理论的构建

初刻本与二刻本关于《国风》次第的差异主要源于魏源对今文经学理论的探索和建构。魏源同刘逢禄学习,受到刘逢禄今文经学观念的影响,用今文经学的观念来指导自己的经学研究。刘逢禄是今文经学的开创者,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春秋》公羊学中,今文经学的观念和理论尚处在探索中,刘逢禄在给《诗古微》初刻本所作的序中说:“予向治《春秋》今文之学,有志发挥,成一家之言,作辍因循,久未卒业,深惧大业之陵迟,负荷之损越,幸遇同志勇任斯道,助我起予。”<sup>[4]</sup>魏源用今文经学的观念和方法对《诗经》和《尚书》进行了研究,丰富并深化了今文经学的观念和理论。公羊学是今文经学的核心,其主要研究旨趣是探究《春秋》的微言大义,其主要研究方法是探究《春秋》的义例。魏源把这种旨趣和方法应用在《诗经》的研究中,“《诗古微》何以名?曰:所以发挥齐、鲁、韩三家《诗》之微言大义,补苴其罅漏,张皇其幽渺,以豁除《毛诗》美、刺、正、变之滞例,而揭周公、孔子制礼正乐之用心于来世也。”<sup>[5]</sup>《国风》次第就是孔子正乐微言大义的重要之处。刘逢禄说:“则请以《春秋》义法核之。《诗》何以《风》先乎《雅》?著《诗》、《春秋》之相终始也。《风》者,王者之迹所存也,王者之迹熄而采风之使缺,《诗》于是终,《春秋》是始。”又说:“变《风》始于《邶》、《鄘》、《卫》,《春秋》之故宋也;《王》次之,《春秋》之新周也。”<sup>[6]</sup>

在初刻二卷本中,魏源确定的《国风》顺序是:《周南》《召南》《王风》《卫风》《郑风》《齐风》《唐风》《魏风》《秦风》《陈风》《曹风》《桧风》《邶风》。魏源认为,这是孔子所确定的顺序,同《左传》记载的古乐相比,孔子所作的改动只是把《王风》提到《卫风》之前,把《邶风》退到最后,又把《秦风》安排到《唐风》之后。关于孔子所改之义例,列《王风》于变风之前,把《王风》所引领的变风当作“一王之史”,见王室之兴衰,“而尊王大义,炳然流行其间”。<sup>[7]</sup>把《邶风》作为《国风》的结尾,是要在东周恢复周公之道,孔子的心思在于此。

魏源在二刻二十卷本中重新排列了《国风》的顺序,并认为这是三家《诗》的顺序,也是孔子所定的顺序。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其“正乐”大致做了哪些工作呢?“后《王》于《邶》,后《邶》于诸国,先《魏》于《唐》,先《桧》于《郑》,及《雅》、《颂》乐章毋失所而已。”<sup>[8]</sup>孔子这样编辑的义例是什么呢?把《王风》放在《国风》后面《小雅》前面,是为了与周朝廷的雅诗相衔接,不能把天子之风混杂在诸侯之风中,提高了《王风》的地位,同样也体现了尊王之义。《卫风》《郑风》列于二《南》之后,因为卫武公、郑武公东迁有功,将其列为变风之首。齐桓公在东周首创霸业,故而列于郑风之后,晋文公又称霸,所以又接《唐风》。秦穆公的功业与齐桓公、晋文公相当,于是又列《秦风》。陈国是以前王朝之后,所以列于《秦风》之后。《曹风》感伤周王的弱小,盼望霸主的出现,故而又列在《秦风》之后。因为《王风》始于东迁,所以各诸侯国的变风随着王室的兴衰而次第排列,这些国风实际上成就了“一王之史”,“于是,习乱则好始治而《邶》继焉,又伤卒乱而《王风》殿焉。”<sup>[9]</sup>学习了这“一王之史”的乱世,就开始寻求治理,于是就接着《邶风》,但是社会最终还是混乱,所以把《王风》作为《国风》的结尾。还有一个义例,桧国被郑国所灭,魏国被晋国所灭,于是把《桧风》放在《郑风》之前,把《魏风》放在《晋风》之前。

可以看到,在初刻二卷本中,魏源所得《国风》顺序无论是与《毛诗》比,还是与《左传》比,其变动非常大,既与古乐不同,又与流传下来的《毛诗》不同。不过,魏源所得的义例无论是尊王,还是对霸主的认同,都与《春秋》微言大义联系紧密。其以《邶风》来展现恢复周公之礼的心思也与历史上那个服膺周礼的孔子形象相符合,这也同《春秋》公羊说中“三世说”的现实世界越乱理想世界越升平相符合。魏源所作的改动虽然理论较严密,但是文献上的隐患是很大的,缺少文献和学术史的支持。因此,在二十卷本中,他采用了郑玄《诗谱》的顺序,只是把《邶》《鄘》合在《卫风》中,他认为这是三家《诗》的顺序,因为郑玄应该有所本。把《邶》《鄘》合在《卫风》中也有一定的基础。邶、鄘、卫三地是西周初年分封的结果,邶、鄘存在的时间不长,很快并入卫国,《毛诗》中《邶风》、《鄘风》中的诗歌其实都是卫国的诗歌。之前,有的学者如顾炎武就认为,《邶风》《鄘风》和《卫风》实际上就是《卫风》,如同商朝又叫殷商一样。这样,魏源二刻《诗古微》关于《国风》次第的排列就可靠多了。但是,把《王风》作为《国风》结束,除了尊王之义外,似乎与公羊说“三世说”的观点距离较远了。

事实上,魏源有更进一步的考虑,他把《王风》放在《国风》最后,与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说结合起来,试图解决《诗经》编辑和《春秋》创作的一些相关问题,从而更全面地探讨今文经学的问题。《孟子·离娄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东汉末年以来,孟子的这个观点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并且形成了很多观点。比如赵岐说:“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颂声不作。”以“王者之迹”为周代“太平之道”,以《颂》和正《雅》的不再产生作为“《诗》亡”。郑玄、服虔认为,变《雅》亡为“《诗》亡”。宋代苏辙认为“《诗》亡”是指变《风》的消失。魏源认为,这些观点都有局限性,苏辙的观点尤其具有迷惑性,其导致的后果也非常严重,“则是谓《诗》非自亡而夫子亡之,《风》非自降而夫子降之,其害义诬经尤甚。推其致误之本,总由但争《诗》之亡不亡,而不究王迹之熄不熄。”<sup>[10]</sup>赵岐以“太平之道”为“王者之迹”,这有些空虚,魏源将其具体化,他认为,“王者之迹”就是周王巡守中诸侯贡诗以观政治得失,从而行庆让、黜陟之权的制度,即周代的采诗观风的制度,“王者驭世之权,莫大乎巡守述职。天子采风,诸侯贡俗,太师陈之以观政治之得失,而庆让、黜陟行焉。故诸侯不敢放恣,而民生赖以托命。是陈诗为王朝莫大之典,黜陟为天王莫大之权。周自宣王以前,举行不废。至东迁之末,天子不省方,诸侯不朝觐,陈诗之典废,而庆让不复出于王朝。迹熄《诗》亡,诸侯放恣,是谓天下无王。天下无王,斯赖素王。”<sup>[11]</sup>那么,“王者之迹”具体消亡于什么时间呢?即周平王末年,《春秋》开始

的时候,周平王四十九年,鲁隐公元年,此时周王巡守观风的制度彻底衰败,王权彻底衰弱。《诗经》中的《王风》、变《雅》都结束于周平王末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魏源强调《王风》与变《雅》,而不是变《风》与变《雅》,“故知变《雅》、《王风》一日不亡,则《春秋》一日不作。”因为变《风》并不终于周平王末年,如《齐风》终于齐襄公,《唐风》终于晋献公,《陈风》最晚,终于陈灵公,这些大致已到了春秋中叶。这些诗是怎样进入《诗经》中去的呢?魏源认为,这是齐桓公、晋献公和楚庄王等霸主采风献给周朝廷的。这些诗歌的收录反映了“霸主之迹”,不是“王者之迹”,这时周王朝虽然有采风的制度和事实,但是这一制度的核心观风知俗和行庆让、黜陟的权力,周朝廷和周王已经彻底失去了。孔子作《春秋》起于鲁隐公元年,即周平王四十九年,就是基于周朝廷和周王这种制度和权力的衰落。所以孔子作《春秋》行素王之政,尊周王,黜陟贬让诸侯,正是继承和发扬了采诗观风的制度和精神,这也是《诗经》的精神。孔子要用《春秋》和《诗经》来恢复周公的礼乐制度,“明乎《诗》亡《春秋》作之谊,而知王柄、王纲不可一日绝于天下,而后周公、孔子二圣人制作以救天下当世之心,昭昭揭日月,轩轩揭天地。请以告世之读《诗》、读《孟子》者。”可以说,魏源怀着激动的心情,觉得发现了《诗经》和《春秋》的一个秘密。《王风》在《国风》中殿后,与后面变《雅》的收集和消亡时间一致,“欲近《雅》、《颂》,与王世相次也。”这是孔子正乐的结果。所以《王风》世次在魏源今文经学理论中有特殊的意义。

魏源对《国风》次第义例的阐释在今文经学观念的指导下,吸收了程颐、朱熹的一些观点,进一步发挥并论证了刘逢禄的观点,成为清代今文经学理论的重要内容。

### 三、《国风》次第的现代审视

《诗经》是一部诗歌总集,《国风》次第有没有义例,它的含义是什么,现代《诗经》研究基本上回避了这些问题。笔者认为,这些问题仍然值得研究,而且魏源等前代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值得借鉴的。在问《国风》的次第有没有意义之前,我们还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国风》为什么有“十五”《国风》?笔者认为,这些问题是相关联的。

“十五”《国风》并不是十五个邦国的诗歌,而是包含周南、召南、王畿、邠等四个地域和邶、鄘、卫、郑、齐、魏、唐、秦、陈、桧、曹等十一个诸侯国。周南、召南两个地域包含很多封国,具体数量不清楚,王畿内不分封诸侯,邠地是周族迁到丰镐之前的根据地。邶、鄘、卫是西周初年对殷商王畿划分的三个地区,郑玄认为在这三个地方分封了诸侯,但不久邶、鄘并入卫国。因此,十一《国风》只有九个,清代学者崔述说:“旧说‘周太史掌采列国之风,今自邶、鄘以下十二国风,皆周太史巡行之所采也。’余按:克商以后,下逮陈灵近五百年,何以前三百年所采殊少,后二百年所采甚多?周之诸侯千八百国,何以独此九国有风可采,而其余皆无之?”<sup>[12]</sup>崔述的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西周初年诸侯国林立,为什么只有九国呢?《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来鲁国聘问,“请观于周乐”。季札所观周乐有歌和舞两种形态,其中所歌与今本《毛诗》稍微不同,《国风》中无《毛诗》中的《曹风》。可以看出,《诗经》作为周乐中歌的乐章是有一个固定系统的,汉代所传下来的《诗经》基本反映了这一系统。《国风》系统是西周初年所确定的,这里所说的系统主要指地域系统而言。这有一些明显的证据,如邶国、鄘国、卫国之分,是西周初年周武王伐纣之后分封划定的格局,尽管《诗经》中这些国风的诗歌全是卫国之诗,刘逢禄、魏源等很多学者都认为其实是一国之风,但是这种名字的留存显示了其由来已久的传统。《唐风》是晋国之风,《史记·晋世家》:“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于是遂封叔虞于唐。”晋国分封之地就是殷商的唐国,周成王将其弟弟叔虞分封于此,到了叔虞的儿子燹时才改为晋,郑玄《毛诗谱》说:“叔虞子燹父以尧墟南有晋水,改曰晋侯。”《唐风》不叫《晋风》,也可以看出《唐风》

之名应该是在周武王、周公时确立的。“国风”是西周初年制礼作乐的重要内容,它是对传统声教之法的继承和发扬。“从时间上来看,周南、召南、邶风都是周部族西周初年甚至更早的作品,本来就是周部族礼乐系统中的一部分,王风、邶风、鄘风、卫风、齐风、魏风、唐风、陈风、桧风、曹风是西周初年武王、周公、成王封建时确立的邦国音乐系统,这些共同构成了西周的国风系统。郑和秦是东周所建立的邦国。我们发现这些国风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这些国家都是华夏族群的代表,其所封之地是华夏族群交往活动和形成的重点区域。”“周初礼乐制度中‘国风’的建设和划分正是基于华夏族群文化的确立和教化的推广”。<sup>[13]</sup>钱穆先生说,周人势力东移主要有南北两条路线,“第一道由陕西出潼关,向河、洛,达东都,经营黄河下流。此武王伐殷、周公东征之一线。”“第二条由陕西出武关,向江、汉,经营南阳、南郡一带,以及淮域。此文王化行南国之一线。”<sup>[14]</sup>这两条路线实际上也是华夏族群融合过程中东西移动的主要路线,除唐风以外,魏、王、邶、鄘、卫、桧、陈、曹、齐等九地都分布在第一条线即北线附近。可以说,《国风》的地域及其数量的确定都是西周初年周武王、周公以制礼作乐为基础而设置的,是西周初年统治者对政治和文化考量的结果。《秦风》《郑风》是东周初年确立的,十五《国风》的数量是叠加而成的,但是其地域仍然是之前十三《国风》的地域。

十五《国风》次第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可以从《国风》最初设置时的情况来看。十五《国风》包括邦国和地域之风,西周的邦国有九个,即邶、鄘、卫、齐、魏、唐、陈、桧和曹,而且这九个邦国都是周武王伐纣之后分封的,这个顺序是季札观乐时的顺序。我们说过,这些邦国的地域都是华夏族群交往融合的重要地点,受华夏族群的影响也非常深。我们观察《左传》中的这个次第,可以发现它大致有一个基本的排列原则,那就是分封时这些邦国诸侯在周王朝建立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尊贵与否。《史记·殷本纪》武王伐纣之后,立即“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令修行盘庚之政。殷民大说。于是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帝号,号为王。而封殷后为诸侯,属周”。《周本纪》也说:“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禄父的封地就是殷商王畿的地域,管叔、蔡叔相禄父,这三种势力就是邶、鄘、卫三地的划分。可以说邶、鄘、卫地域的安定和教化的好坏关乎着周朝廷的安危,其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齐地也是这样,周武王也分封了功臣,《史记·周本纪》:“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齐国的爵位是公爵,地位尊贵,于是《齐风》列于《卫风》之后。魏、唐、陈、桧、曹中,陈是公爵,地位尊贵,但是其功不显,桧为异姓子爵,地位较低,所以排序靠后。曹国是周武王之弟叔振铎的封地,爵位尊贵,但振铎功绩似乎不显。魏国是同姓封国,世系不清楚,唐国是异姓之国,是殷商旧国,其世系和爵位不清楚,但从其不久叛乱可以看出,它是西周初年非常重要的一股势力。我们说这五国次第也是根据其地位和功绩而列的,通过零星的史料来看,大致是能说得通的。孔颖达说:“盖迹其先封善否,参其诗之美恶,验其时政得失,详其国之大小,斟酌所宜,以为其次。”在孔颖达看来,《国风》次第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如分封先后、诗歌的美恶、政教得失、国之大小等,是非常合理的。笔者认为,分封先后、国之大小这些标准与我们所说诸侯的功绩大小和尊贵与否有相通之处。周武王灭商两年之后去世,其划分这些区域的政教得失、诗歌美恶与否还不能显现。西周初年,周武王分封邦国是新秩序的形成,《国风》次第的安排必然受到这一秩序的影响,周人基本制度“皆由尊尊亲亲二义出。然尊尊亲亲贤贤,此三者治天下之通义也。周人以尊尊亲亲二义,上治祖祢,下治子孙,旁治昆弟,而以贤贤治官”。“且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使天子诸侯大夫士各奉其制度典礼,以亲亲、尊尊、贤贤明男女之别于上,而民风化于下,此之谓治,反是则谓之乱。”<sup>[15]</sup>《国风》地域的选择是尊崇华夏族群文化的结果,作为邦国的《国风》次第体现贯彻“尊尊”和功绩大小的原则也是很自然的,功绩大小也就是“贤贤”。

《周南》《召南》是文王时期化行南国的诗歌,是“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理应放在《国风》的前面,这是各家都赞同的。郑国最初是西周朝廷的畿内之国,秦国是附庸,它们在东周初年正式成为诸侯国,它们成为诸侯国是与它们对东周朝廷的贡献分不开,所以《左传》记载的音乐系统中,《郑风》在《齐风》之前,《秦风》在《魏风》之前,大致延续了西周《国风》次第的原则。《王风》和《邶风》较难确定。关于《王风》,很多学者认为是东周设立的,也有很多学者认为是西周设立的,笔者赞同后面一种观点,顾炎武说:“邶、鄘、卫、王,列国之名,其始于成、康之世乎?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采于商之故都者,则系之邶、鄘、卫,采于东都者,则系之王;采于列国者,则各系之其国。”<sup>[16]</sup>正像顾氏所说的那样,《王风》的确立应该在周成王时,《史记·周本纪》:“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武王时,有营建洛邑的计划,并没有实施,所以不太可能将其作为观风区域,营建好洛邑之后作为“国风”区域是可行的。《王风》作为东都之风,地位很高,将其列在《邶》《鄘》《卫》之前或之后接皆可说。《邶风》起初的情形很难知道,作为邶地之风应该早于《周南》《召南》,但是从现在收录的诗歌来看,除《七月》外,都是周公所作,因此以周公诗为主的《邶风》形成应该在周公还政之后的周成王或周康王时代,作为周公之诗,季札所观之周乐将其排列在《齐风》之后是合理的。《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所观之周乐中的《国风》次第基本反映了西周时期《国风》次第,大致反映了西周初年《国风》设置中“尊尊”和“贤贤”的原则。

《论语·子罕》:“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关于“正乐”是矫正篇章次第,还是矫正音乐,有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两者应该兼有,但是不管怎样,孔子矫正时所依据的标准应该是周乐,孔子编订《诗经》时《国风》的次第应该与《左传》记载的周乐相同。《毛诗·国风》的次第应该是流传过程中篇卷失次与经师解说共同造成的,其大致保存了原来的次第。魏源认为,郑玄《诗谱》的顺序采取的是《韩诗》《鲁诗》的次第。三家《诗》关于《国风》的次第应该与《毛诗》相同,《诗谱》的次第应该是郑玄自己研究的结果。因为,很明显《诗谱》的次第是综合《左传》和《毛诗》次第的结果。《毛诗》将《邶风》移到最后,将《秦风》移到《唐风》后面,《诗谱》认同了这个顺序,然后在此基础上将《王风》移到最后,而将《桧风》移到《郑风》前面。这样就形成了郑玄的研究义例,而改变了古乐次第的顺序和原则。魏源吸收了《诗谱》的次第并进行了非常系统的理论阐释,正像黄仲松评论朱熹的观点那样,“稍为贯串,终亦牵强”。魏源为了使其理论贯穿而改变今本《毛诗》篇章的所属,如将《王风·黍离》归入《卫风》。尽管如此,魏源关于《国风》次第义例的研究是清代今文经学最完善、最系统的,是清代今文经学的重要内容。

#### 注释:

[1][2][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69、269页。

[3][清]黄中松:《诗疑辨证》,《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编委会:《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经部十六集,沈阳:沈阳出版社,1998年,第8226页。

[4][6][清]刘逢禄:《诗古微序》,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魏源全集》第一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731、729-731页。

[5][7][8][9][10][11]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魏源全集》第一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99、28、207、206-207、208、208页。

[1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81页。

[13]李树军:《〈诗经·国风〉与声教之法》,《学术论坛》2013年第10期。

[14]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6页。

[15]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姚鼐铭、王燕:《王国维文集》第四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52-54页。

[16]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14页。